

本书在中国社会研究和史学方法上，
有卓越见解。

梁园东

姚奠中 梁归智 选编
山西人民出版社

史学论集



对社会政治制度及种族、民族、
图腾等问题，也有深入探讨。

晋新登字6号

梁图东史学论集

姚奠中 梁归智 选编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5字数：259千字

1991年9月第1版 1991年9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1—740册

*

ISBN 7-203-01805-9

F·260 定价：6.50元

目 录

梁园东教授传.....姚奠中（ 1 ）

《古史辨》的史学方法商榷.....（ 18 ）

清俞正燮的史学.....（ 58 ）

伪书讼冤导言.....（ 72 ）

处理中国上古时代史料的方法问题.....（ 85 ）

商人自契至汤八迁重考与商民族兴于东土驳议.....（ 121 ）

景亳考兼论《商颂》年代.....（ 137 ）

汉代中国民族之南迁.....（ 154 ）

古交趾考.....（ 168 ）

“桃花石”为“天子”，“桃花石汗”为“天可汗”说.....（ 181 ）

中国民族之名称.....（ 195 ）

回纥史译注.....（ 205 ）

中国民族中之通古斯族系.....（ 231 ）

中国民族之特点.....（ 244 ）

古姓考原.....（ 258 ）

井田制非土地制度说.....（ 263 ）

从历史上观察中国的土地问题.....（ 272 ）

《韩非子》中之专制主义·····	(285)
门阀观念不始于魏晋考·····	(292)
关于《诗经》“蟋蟀”篇的解释问题·····	(303)
中国史的发展阶段·····	(315)
后 记·····	(328)

梁园东教授传

姚 奠 中

梁园东，原名佩衮，字公宇，一九二七年起，改今名。山西省忻县温村人。生于一九〇一年（清光绪二十七年），卒于一九六八年一月三十日。父亲名际蓉，是个旧民主主义革命志士，清末留学日本，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期间，参加了太原起义。民国建立，阎锡山控制了山西的军政全权，排斥异己。他只担任了几年榆次县的知事，就弃官从事蚕桑实验，在太原开设销售商店。这个商店后来就成了共产党地下活动的掩护据点。他的思想和行动，对青年时期的梁园东，起了很好的教育作用。梁园东上中学以前，在家乡读私塾，受教于叔祖、前清秀才梁歌九，熟读了四书、五经，打好了阅读古籍的基础，为后来研究古史准备了初步条件。

一九一六年，梁园东十五岁，考入省立第一中学。他在四年中学期间，节衣缩食，刻苦攻读。他对书籍特别爱好，经常出入于新旧书店，广事搜购，对新出书刊，更不放过。很快，他home便成为周围藏书最多的人家，他自己也成为学识相当广博的年轻人。

一九二〇年，梁园东中学毕业，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二年入哲学系。当时的北京大学，经过五四运动，在蔡元培领导下，不但是全国首屈一指的最高学府，而且是新思想、新文化运动的根据地。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陈独秀、李大钊等先进人物倡导下，北京大学的共产主义思想传播很快，另一方面以胡适为首的宣扬资产阶级思想的人则与之相抗。“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即是焦点。梁园东是一个热情、刚正、有抱负而又沉静好学的人，一开始他接受了胡适的一套，潜心读书，但面对北洋军阀统治下内忧外患越来越严重的现实，使他坐不下来。因之一接触到共产主义，一下子就看见了前途。他后来回忆说：马克思主义使自己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在北大求学的第三年，经共产党员王壮飞的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其年十月，他在《大夏》杂志发表了第一篇论文《十年来之中国外交》，表现了他对国事的关切和对军阀卖国外交的愤慨。

一九二六年，梁园东在北京大学毕业时，正值大革命高潮到来，他由党组织派到武汉，参加了党领导下的全国农民协会的工作。不久，由于工作需要又被派回太原，任国民师范教员，在他父亲梁际蓉的支持下，同时开展党的组建工作。他是当时山西党的负责人之一，除一般组织宣传外，主要负责财务。这期间，他和梁春霆、赵镜如、续俭等人，筹办出版了《滂沱》杂志。这是个不定期的刊物，名为文艺，实际宣传革命，先后发行了四期。与此同时，他组织了“滂沱社”，吸收进步青年，以进山中学学生为主，发展到百余人，成为当时和后来学生运动的重要力量。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蒋介石叛变了革命后，国民党

山西省党部成立了反动的“清党委员会”，镇压共产党。被搜捕的梁园东由续俭等人掩护，逃离太原，只身赴上海。而他父亲却和梁春霆、赵镜如先后被捕，扣押期间，受到非刑拷打。赵镜如死于狱中，梁春霆监禁一年后保释。他父亲在羁押半年后获释，但因受折磨而得不治之症，不几年于穷困中死去。

梁园东一九二七年秋到了上海，党组织已被迫转入地下。他没有找到党，从此脱离了组织。他在苦闷中深感自己对中国社会、中国历史知道得还很少，同时为了生活，便转向文教界，转向对中国社会历史的系统研究。他先后在上海劳动大学、浦东中学任教，及在大东书局任编辑，最后在大夏大学任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这期间，他除编著了高初中历史课本外，还出版了《五代十国史》、《中国文学史》、《爪哇史》等书。同时在各文史杂志上连续发表论文，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阶段、性质同陶希圣、梅思平等人进行了论战。在史学方法上，以《古史辨》为目标，对顾颉刚代表的“疑古派”进行了批评。他这时期的论文，有两大特点：一是有创见。他不迷信书本，也不迷信权威，而十分重视史料；一是面向现实。他绝不是为古史而古史，而是为了总结历史，指导现实。他的文章中，提出了不少具有真知灼见的论点：针对一些人拿欧洲史套中国史的现象，明确指出“中国不同于欧洲”（见《中国社会的基础》）。针对一些人认为秦、汉以后中国已不是封建社会的说法，指出“秦、汉以后，仍然是封建国家”，“官吏制度、郡县制度是行使封建权力的另一种方式”（同上）。他认为“中国社会自秦汉以来直至当时，本质上改变很少”，“最近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资本主义的侵蚀，中国社会发生了真正的变化”，“但中国不能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只能成为半殖民地社

会”，“出路只有从救济农业入手”（见《中国社会的前途》）。这些发表在三十年代初期的文章，对中国前途的探索已接近科学的结论。他进一步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在半封建的制度之下，产业实无发展的可能。要打开这种困难，除非用迅速而有效的办法，把这样旧有的、根本无发展希望的组织改造过来，中国的经济才有发展的希望。”（《中国社会问题的核心——实在组织问题而非经济问题》）他所谓的“组织问题”，实际上就是制度问题，所谓“组织改造”，实际上就是社会革命，只是用词上比较隐蔽而已。他还指出中国民族的前途，只有“采取萨拉森拥护‘阿尔拉’的精神，把中国民族所认为真理的和最合理的生活组织，极力扩大……使全体人类都归于合理的路途，以实现我们两千年前早已想到的‘大同主义’的理想社会”，最后他大喊“起来吧，中国民族！”（见《中国民族的特点》）显然，他所谓的“最合理的生活组织”，所谓“大同主义”实质上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同义语。他的一系列的论文，是当时文化反围剿战斗的一部分。

在研究历史的方法上，他对一百多万字的顾颉刚的《古史辨》，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批判。他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长文《古史辨的史学方法商榷》，连载了两期。他认为《古史辨》在史学方法上完全是错误的，“简直走到一条绝路上去”了。他指出顾颉刚走的是清儒崔东壁的老路，所以顾氏的“辨伪”和崔氏的“考信”，竟“殊途同归”！他说：司马迁选用史料时，有一条错误的标准，即“雅驯”，而“雅驯”之言，就是“荐绅先生”或“儒者”所说。这样就把许多儒者不说的重要资料都排斥了。崔东壁更进一步，连一般儒者的“雅驯”之言也不行，而只信几部经典，即使是“传”，也只作参考。所以

“从方法上看，崔述（崔东壁名述）更比司马迁坏多了”，因为司马迁是“经验判别不来时”才这样做，而崔述则是“直认真正儒者之言，就是信史”，“明明在经验上可判别来百家言也有可信的事实时，他也绝不敢采取”。他认为顾颉刚虽曾批评崔氏的“尊经卫道”，而结果却走的是同一条路，不过只比崔氏放宽了一点。崔氏以“真古经”为研究古史的起点，而顾氏则以“真古书”为研究古史的起点。他指出“依赖古书的真伪”，“来判古史的真伪”，根本不是史学方法。顾氏本以“真古书”所记，一定是“真古史”，哪知研究的结果，却发现“真古书”是十分凌乱，全“不可靠”，于是从崔述的“考信”变成了他的“辨伪”。结论是：古史全是孔丘以下的一类人伪造的“伪史”。而伪造古史的过程，则是“层累地造成的”！至此，顾颉刚等人全盘否定了古史的记载！在他们的“考证”下，不但尧舜以前所有传说全被抹杀，连“禹”也成了“一条虫”！鲁迅在《理水》中讽刺的“鸟头先生”，正是对此而发。在三十年代初期，“疑古派”风靡一时，连章太炎的大弟子之一的钱玄同，文章署名竟用“疑古”二字代替了钱姓而写作“疑古玄同”。梁园东却能抓住“疑古派”错误的要害，而予以有力的批评。梁园东之所以能有如此的真知灼见，则是因为他初步掌握了历史唯物主义，并具有了社会发展的观点，因之目光如炬。梁园东既反对只在古书里打滚的史学方法，也反对以所谓“辨伪”的方式否定古书的态度。他对所谓“伪书”之所以被认为“伪”，作了精辟的分析，从而肯定了古书和考古学相辅相成的关系。（见《伪书讼冤导言》）他在否定他的老师胡适大力推荐的崔东壁的《考信录》的同时，另举出清代俞正燮的《癸巳存稿》和《癸巳类稿》，认为俞的史学

方法“更正确”，“俞正燮实是一个极有特殊眼光而又极精严的历史学者”，“他是真能不以古况今或以今释古的”（见《俞正燮的史学》）。这种见解确比胡适高出一筹。其它如对土地问题、民族问题、门阀问题以至学校问题，都发表了不少卓越见解。比如他说：历代的学校制度，几乎没有不是为专门培养官僚而设的。”（见《唐代的学校》）“培养官僚，正是中国教育的特点”，“所以中国历史上的学校，不应当称为学校，正名定分，应当称为‘官僚养成所’”（同上）。提得很尖锐，而且抓住了实质。可以说三十年代是梁园东学术著作最旺盛的时期，而他的学术成就，则是他的进步的立场、观点、方法所决定的。

从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变，经一九三二年的“一二·八”淞沪抗战，到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学生抗日运动，梁园东虽不在斗争的第一线，但在学校的课内课外，总是宣传进步思想，热情支持学生们的爱国主义活动。他在广大学生中间，博得了“进步教授”的名声。他和当时在上海的进步学者邓初民、侯外庐等人有较多联系，而对同乡陈高塘、同学陶希圣等人，则越来越疏远，对另一同乡卫聚贤的所谓考古成绩，更每予以嘲笑。所以梁园东在三十年代的上海，绝不是一个宁静的学者，而是与时代脉搏息息相通的文化战士。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开始。梁园东随大夏大学西迁，年终到达贵阳。从此年起到一九四六年夏，他先后在大夏大学转湖南兰田师范学院，转四川白沙女子师范学院，转四川乐山武汉大学任教授。在这九年间，他在教学的同时，仍继续搞学术研究。但由于资料条件和出版条件的限制，发表的东西相对减少了。在考证方面，他发表了《景毫考兼论商颀年

代》和《桃花石为天子》等文章，又因当时研究边疆史地的需要而译注了《回鹘史》一书。这时期正是八年抗战时期，表面上国共合作，团结抗日，而实际上国民党反动派却一次次掀起反共高潮，对思想的控制也更严了。梁园东在到贵阳的第三年，曾和青年们筹办了一个刊物，但未及出版，就被书报检查机构查禁了。他一气而决定离开贵阳去湖南。在湖南兰田师范学院，他受到学生们的热烈欢迎，而该院院长却在学生中散布“梁某的史学走的不是正路”的谰言！他提出抗议，对方虽一再道歉赔礼，但他以为“不足合作”而转赴四川。在白沙女子师范学院，院当局要他兼系主任，而系主任却需要到“中央训练团”受训。他不想作这个系主任，但却想借机会看看国民党在搞什么？他怀着自己的目的去了重庆。他一到“训练团”，团的头头们很高兴，认为梁园东转过来了，便亲自接见，随后就送来入党（国民党）申请书。他不填。那些人很惊讶，一再劝诱，他坚持不动。问他：为什么？他说：“入党自愿，不能勉强，一定要我入党，那不违反你们的党章吗？”他进一步还说：“你们定的训练的目的、任务不合理，我不能接受。”那些人冒火了，说：“那你来干什么？”他说：“我是学历史的，应该了解一切情况，作一些社会调查。”这一下，他当然成了不受欢迎的人，便被提前遣送回白沙，而且通知学院立刻把他解聘。院长谢循初不同意，回答他们说：“梁先生是教授，没有犯法；没有到期，不能解聘。”这是一九四三年冬天的事，此后常有特务便衣监视他的行动。到了一九四四年夏天，聘期满了，他才应武汉大学之聘去了乐山。这年冬天发生了国统区的湘、桂大溃退，蒋政权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面目已暴露无遗。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宣布投降后，蒋介石却想独

吞胜利果实，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挑动内战，这种倒行逆施，自然遭到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普遍反对。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重庆和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建立了广泛的统一战线，进行政治斗争。在武汉大学的梁园东，虽僻处乐山，但积极支持民主运动，与进步人士有不少联系，并听过周恩来的时事报告，认识了周恩来。周了解到他的家属仍在老家，曾专电延安转请山西忻县地区民主政府予以照顾。

一九四六年八月，梁园东随武汉大学迁回武昌。从这时起到一九五〇年七月的四年间，发表的文章有：《中国史的发展阶段》、《中国古代图腾部落之一——白虎族考》和《研究中国上古史的方法》等文。关于“史的阶段”的划分，他有独立见解，也掌握了丰富的资料，从上海时起，他就不同意郭沫若把周代划入奴隶社会的观点，而认为周代是“典型的封建社会”。此文就是对原有论点的发挥。“图腾”一文，是他长期研究图腾学的部分成果，“史学方法”一文，则是他一贯坚持唯物史观方法论的总结，文章中明确指出：必须“以社会发展史的观点处理上古史的材料”，“才能解决上古史的问题”。显然只有这样，才能扫除长期以来历史研究上的混乱状态。

武汉大学迁回武昌不久，梁园东支持缪朗山教授创办俄语学习班，他自己也积极参加学习俄语，为直接阅读苏联书刊作准备。一九四七年初，在时局逼迫下，以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为内容的民主运动，风起云涌，武汉大学学生于五月下旬组织了和平促进会。在成立会上，他和几位进步教授发言支持，得到学生们的欢呼。不料，五月三十日的深夜，学校突然遭到军警的包围，按黑名单进行大逮捕。次日凌晨在全校学生救护被捕师生的过程中，军警开枪镇压，当场打死学生三人，

伤十余人，同时逮捕了梁园东和缪朗山、刘颖、金克木、朱君允等五教授和学生二十余人。这就是当时震动全国的“六一惨案”。在全国各大学的大力声援下，经学校当局的多方营救，梁园东和被捕师生先后获释。一九四八年，他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教育协会，负责武大教师支部的工作。在次年武昌解放前夕，他积极支持全校师生进行了护校斗争，迎接解放，并在汉口举行的全市人民庆祝解放的大会上，他应邀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这年他四十八岁。

一九四九年十月新中国建立后，梁园东主持了新成立的武汉市史学会。他印发了自己的《研究上古史的方法》一文，供同志们参考。一九五〇年八月，他接受山西大学校长邓初民和副校长赵宗复的邀请，回太原任山西大学历史系教授兼师范学院院长。一九五三年秋后，师范学院独立建院，他被任命为山西师范学院院长。这几年，是梁园东心情最舒畅，精力最充沛的时期。他一心一意为实现多年的理想抱负，为年轻的人民共和国文教事业的发展而贡献全副力量。由于山西大学曾经过长期的艰苦历程，基础比较薄弱，所以他到校后，首先是大力延聘教师。那时教师流动还比较容易，他从全国各地招聘来不少有名望、有学问、有教学经验的教授、副教授，较快地配备起院系各系的教师班子。当时的邓初民校长，是他的老朋友，是著名的教授、学者；赵宗复副校长，尽管多年从事党的教育行政工作，但从不放弃科研，常发表文史方面的文章。他们相得益彰，再加上解放后教师们具有的空前的积极性，一时学习和学术空气相当浓厚。梁园东身为院长，行政工作之外，既不放弃教学，也不放弃科研。他开始把多年来的研究心得，写成一部通史。一九五一年夏天，他又接受了教育厅委托创办六个专修科

的任务，一下子增招了四百个新生。他除加聘了十来位教师外，充分发挥各系教师的潜力，解决了教学方面的一系列困难。他的办公室（连师院在一起）只有一个干部，一个工人，一切行政由他一人处理（没有副院长），而他还能挤出时间听教师们讲课，不时给上课教师提出合理建议。他就这样不知疲倦地、愉快地工作着！

当师范学院独立建院而他担任院长之后，他首先抓的是建立制度。他组织了几位有经验的教授，制定“师范学院学则”，希望通过教学、行政、科研的制度化，使山西师范学院在若干年内走上高等教育的先进行列。一九五四年以后，师院迁入新址，六个专科并入有关各系，普遍建立教学研究组，提高教学质量，进一步充实教师队伍，扩大招生等一系列措施，都是在他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那时只有一个副院长，还兼着教务长职务，所以他事必躬亲，从不惮烦。也就在这一年，他先后出版了《中国政治社会史》第一、二、三分册。其内容论述了从原始社会到东汉末的政治社会史实，是他长期研究的总结。他在“序”中说：“本书拟从政治社会各种形态中，分析中国社会演变发展的实况”。“几千年的中国社会是一个长期的封建社会。它所占的时间虽长，但它仍时时在发展中、变化中。如果我们能看见它活生生的演变实况，就绝不至有“停滞之感，更不会有‘循环’、‘再现’等错误感觉。它的错综复杂的史迹，从它们彼此的联系、产生的法则和发展规律看，随时都证明了马列主义理论的正确性。”可见他的这部著作，是既重规律，又重史实的，是“论”与“史”相结合的。从书的内容所体现的写作特点看，它几乎是由论文联结而成，都是他长期来研究中国古代政治社会的结论，处处闪耀着真知灼见的光芒，

而又有充分的史料为根据。当然不能说他的每一个结论都是正确的，但他的论点却能给读者以启发，使研究工作向更深更广的道路推进。这就是很好的贡献。可惜他的书没有写完，而部分未刊的稿子也在“浩劫”中毁掉了！

为了提高学院的教学水平，梁园东非常重视科学研究。他是以“爱才”著名的，他对教学好的教师，要求他们科学研究也好。他在百忙中没有忘记抓“学报”。经一年多的准备工作，《山西师院学报》第一期于一九五七年二月出版。其中，他发表了《关于诗经“噍嘻”篇的解释问题》，是与臧之《关于周颂“噍嘻”的解释》一文进行商榷的，实际也是与郭沫若进行商讨。他认为臧之对“噍嘻”的解释不准确，因而对“奴隶制到封建制的过渡”的判断也不准确。在此文前后，他还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中国史的问题》一文，被收入《新华》半月刊。又在《山西师院学报》第四期上发表了《处理中国上古史料的方法问题》，还向中国史学会提出《有关中国史分期的意见书》。可见他在不知疲倦的工作之余，还多么勤奋地进行着科学研究！

一九五六年秋，梁园东受九三学社中央的委托，负责筹备太原分社，他担任了主任委员。在他的带动下，太原各高等学校许多教学科研有成就的教授专家，纷纷参加九三。但由于他是个有肝胆、有抱负、有强烈事业心而胸无城府的人，应付复杂的社会人事矛盾，非其所长。他从担任院长以来，作的事多，管的事多，又作了九三学社太原分社的负责人，这本来是好事，但在“左”倾路线影响下，是非颠倒，他被说成“好大喜功”，认为他夺了“党”的“权”！到了一九五七年终反“右”末期，便突然把梁打成“右派”！次年五月，梁被撤职

降级，只以省政协常委名义，移居政协宿舍。梁园东多年来申请重新入党的愿望不但没有实现，结果却成了党的反对面！这是他怎样也不能理解的。当时从省委到群众，为他抱屈的人很多，但在“左”的形势下，没人敢说话。在这一浪潮过了之后，一九六〇年便较早地为他摘掉“右派”帽子，恢复原级。

梁园东在精神上受到这样严重的打击之后，仍没有忘掉事业，没有忘掉为人民，没有忘掉为社会作贡献。在政协驻会的头几年，他首先草拟了《编撰山西近代革命史计划》。计划中包括编撰《山西近代革命史资料》和《山西近代革命史》两部分，而且写出了“提纲”，指出这一工作的目的“不仅仅在保存材料，而是要通过革命史的叙述，说明山西人民在封建地主、反动政府和帝国主义的三层压榨下所受的苦难，重新唤起山西人民对敌人的仇恨，继续激发革命情绪，进而巩固党领导下的革命成果，为不断革命和不断胜利作基础”。与此同时，他还把多年来对图腾学的研究，拟写成《中国原始时代的图腾氏族》一书（上编已写出大部分，下编只有目录）。他在卷首说明中说：“在有关氏族社会的传说中，经常碰到一大堆名字，即所谓古帝王的姓氏名称。究竟指的是什么？是神？还是人？是氏族名称？还是个人名称？其实更重要的是这些姓氏名称，有许多必是当时的‘图腾’（totem）名称”。“如果不了解这些名字的图腾意义，那就不唯对氏族社会的一项重要制度不能明了，同时因对氏族团体的意义不明，那就对各氏族内婚姻的、宗教的、社会的、政治的、各项生活及关系，皆将无法进一步探索 and 了解。这样当然也谈不到氏族社会史的研究了。所以欲进行中国氏族社会史的探索，首先必须对传说中那一大堆所谓古帝王名号，先作一番清理工作，发掘出它们的图

腾意义，才能进一步研究它们中间的关系及其历史。这一段工作是初步的，然而却是极其必要的。”这部稿子没有写完，他却突然患了半身瘫痪，右手已不能写字。他虽然顽强地向疾病做了斗争，但力不从心，无可奈何！这真不只是他个人的终身遗憾！

一九六六年秋，“十年动乱”开始，梁园东被遣送回忻县温村老家，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渡过了一年半。一九六八年初，脑溢血突发，遂于一月三十日逝世于忻县医院，终年六十七岁。在他逝世十年之后的一九七八年，梁园东的冤案才得到昭雪。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五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西省委员会和中共山西省委统战部联合为他举行了追悼会，会上肯定了他一生对国家、民族忠心耿耿，坚持进步和在教育事业、学术研究上的多方面的贡献。他对人民的劳绩和在学术上的成果，都将永垂不朽！

附录：

（一）梁园东著述辑目：

- | | |
|----------|----------------|
| ①初中历史课本 | 1929年前后 |
| ②高中历史课本 | 1929年前后 |
| ③中国文学史 | 1930年前后 |
| ④五代十国史 | 1930年前后 |
| ⑤爪哇史 | 1930年前后 |
| ⑥中国政治思想史 | 1933年前后 |
| ⑦外国史（二册） | 1933年前后 世界书局出版 |
| ⑧中国现代史 | 1933年前后 世界书局出版 |